

我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容闳述评

汤才伯

容闳是我国第一个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我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维新主义者。了解、研究容闳一生的主要事迹及其思想，对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认识近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的遭遇，不无助益。

入世謀生 謀食亦謀道

容闳，字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一八二八年出生于贫苦家庭。七岁在澳门英国人办的“西塾”读书，十四岁进入香港美国勃朗创办的“玛礼逊学校”学习。一八四七年勃朗因病回国，他也随着去美国学习，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一八五〇年考入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一八五四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当外国侵略势力靠着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和其他条约，进一步侵入中国时，容闳从美国留学归国，开始“入世谋生”。他回国后，想实行在美求学时已“规划大略于胸中”的“教育计划”。但在闭关自守、风气未开的中国，他一时无法提出来，只好先找工作做。他对参加工作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谋食亦谋道”。他说：“于社会中得一职守，此非仅为家人衣食，欲有所藉手达予维新中国之目的，谋食亦谋道也”^①。由于他工作目的比较明确，所以在洋场里工作能表现出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

一八五五年，容闳在香港审判厅任译员时，兼学法律，准备在香港当律师。但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律师只能是英国人，容闳是中国人，如当了律师，那就是外人侵入英国法律团体。因此，他受到英国律师的排挤，并在报纸上写文章攻击他。容闳不愿受欺侮，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一八五六年容闳来到上海，在海关担任通事。但海关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是无权过问的。容闳进海关不久，发现海关与外国商人“威逼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他对这种贪污、走私和贿赂行为“深恶其卑鄙”，不想在这地方混下去，决定辞职。有一次，他去问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将来他能否升至总税务司之职。这位洋人傲慢地对他说：“凡是中国人做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他听后极为气愤，斥道：“予与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李泰国对容闳的质问虽很不高兴，但知道容闳是个很有才能的人，想挽留他们为他们服务。李泰国以为容闳“嫌俸薄，故以辞职相要挟”，于是把他的月薪从一百元加到二百元。可是，一百元的代价没有打动容闳，他还是坚决地离开了海关。其实，容闳并不想升总税务司，而是别有“高尚的志趣”。容闳反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称王称霸，两次辞职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

对人民的灾难和人民革命，容闳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一八五八年前后，黄河缺口造成大水灾，人民无家可归，纷纷流入上海，无衣无食。容闳见此惨状，代表上海的绅商向外商募集了两万多元，救济灾民。一八五五年，两广总督叶名琛血腥镇压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容闳目睹叶名琛的残暴罪行，激起了他对清王朝统治者的不满，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正当”的。他说：清政府妄图用“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苗之花，使无萌芽之患”。后来，他亲自察访太平军占领的地区，看到太平军“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人民对太平军“较有信用”。对此，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对“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之思想。”他曾一度打算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但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只能停留在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

组织青年出洋留学 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在我国教育史上，由中国政府正式向外国派留学生，是从一八七二年开始的。“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则完全于容闳一人之力”。

容闳倡议组织青年去国外留学，是因为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留学期间，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给美国社会带来日新月异的进步；而这时的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经济文化落后。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快地选派优秀青年到美国或欧洲留学，造就千百个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由他们担当起改变中国落后的任务。

容闳从筹划到第一批留美学生派遣，经过多次周折，费了十八年时间。他回国后，到处碰壁，志不获展，多次改行迁业。直到一八六八年，他被任命为江苏候补同知后，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条陈四则”：一、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选派优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三、开发矿产，以尽地利；四、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说：“此条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他把选派青年出洋留学，看作是为国家培养人材。为此，他建议：先以一百二十名作为实验，每年派三十人，四年完成；十二至十四岁的男孩学习十五年；派几个汉语教习为学生教汉文；在美国设立留美事务所，设正副监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海关收入中指拨一定的经费，作为留学费用。此条陈由丁日昌转军机大臣文祥代奏，后因文祥遇“丁艰”，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一八七〇年六月，“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前赴处理，由容闳任翻译。容闳乘机再向曾国藩等人提出他的教育计划。因容闳的“西学东渐”主张符合曾国藩“求强”的意愿，《中美续增条约》也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③。所以，他的计划得到曾国藩的同意和清政府的批准，并任命他为出国留学的副监督。

一八七一年夏，他们在上海开始招生。当赴美留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于一八七二年初，容闳到美国作安置工作，同年八月十一日，第一批学生詹天佑等三十名，由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带领启程赴美。随同前去的还有翻译和汉语教师三人。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先后四批一百二十名学生，全部赴美。

派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对传统的封建旧学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愚昧统治是一次猛烈冲击。因此自始至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清朝政府中的顽固派，不仅竭力反对选派青年出洋留学，而且对留学生造谣中伤、捣乱破坏，胡说留学外洋是“离

经叛道之举”，“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由于顽固派的破坏，容闳据理力争也无效，因而留学生于一八八一年分三批回国，留学事务所也同时撤销。这使容闳筹划、实施多年的留学生计划就此夭折，留学生的学业半途而废。当时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对此极为感叹，他说：“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莫学文理极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④。

尽管容闳组织青年赴美留学的计划遭到失败，学生未能完成学业，但他们毕竟受过若干年的新教育，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学知识。因此，他们在我国近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这批学生经过几年实践，清政府对他们进行了考核，“试以所习各艺，均能融会贯通，各有心得”^⑤。“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其分赴各营教习者，于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其派值电报者，传递紧要军报，听夕众公，密速无误。他如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均能深明窍要，……造诣有得，足供任使”^⑥。对此，李鸿章也认为，“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确有成效”。“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⑦。事实正是这样，中外著名的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以及近代中国早期的矿业、电报业、造船业和海防方面的建设人才，不少是留学生。

从此以后，由容闳倡议组织的留学教育，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有政府派的，有地方选送的，也有自备资留学的，掀起了向外国学习的热潮。

提出改革主张 力图维新中国

容闳从实际经历中认识到，祖国贫穷落后，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判若天渊”。“中国根本之改革”，已是“不容稍缓之事”。于是，他提出了要改变教育制度，创办工业，建设铁路，开辟海运，设立银行等主张，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尽快地富强起来。

一八六〇年冬，容闳在访问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时，曾与干王洪仁玕多次商谈，向干王提出了七条建议，内容为：（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材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釐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⑧。容闳的建议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目的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太平军领导人对容闳的建议尽管很重视，但未能实行。却在洋务派手里如兴办工业、航运和兴办学堂等付诸实施。当然，他们实行的目的，决不是像容闳所设想的那样，改造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容闳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创立国家银行和组织铁路公司，以及建造津镇铁路计划。他为了创立一个国家银行，先翻译了外国国家银行法律，后又起草了中国国家银行章程。这个国家银行，负有制造硬币，印行纸币，发行公债券，担任国库等任务。在章程中规定：“先设总行于京都，续分设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口岸。”^⑨银行资本为一千万元，包括建造房屋和购买机器设备，还规定建立各种制度，如任用人员的标准，设立

公开、完善的账册等。当这个计划获准，容闳将赴美国实地考察时，却被盛宣怀等人破坏，结果未成。此后容闳又提出了建造铁路的计划，建议“所有东滇南、川广、芦汉、苏松、松沪等处同时并筑，且要建双轨”⁶⁶。他还就建造自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向清政府提出了条陈，指出：该铁路“为南北往来孔道，必宜专筑一路，以为便民兴利之图”⁶⁷。同时，他把筑路与培养人材结合起来，建议“择地设立铁路学堂，凡测绘绘图使车制料等事，均宜选聪颖子弟习学，以为造就人才地步”⁶⁸；又针对清政府用人不讲知识才能，专搞营私舞弊的情形，提出“铁路公司所有聘请管事及雇募役各色人等，均应访察详慎稳重可靠之人，方许留用。仍随时稽察，庶少疏虞，若有官长荐举，友人清托，概不收用”⁶⁹。这种任用人员必须以才能为标准的思想，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

容闳的维新中国的改革主张未能实现，是由于清政府腐败造成的。容闳对此作了深刻揭露，当时“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自上至下，无一不贿赂”，“只要有钱，什么事情可以交换拍卖”。由此可见，不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容闳的改革理想就不可能实现。

直到一九〇〇年，容闳从切身感受和与“戊戌变法”领导人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改变中国落后状况，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统治。一八九九年，容闳等人在上海举行以讨论“关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的集会。他在这个会上被推为“中国强学会”会长，并由他起草了一个对外宣言。在宣言中向各国宣布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要求给人民以立宪的自由等。由于这一行动，容闳被清政府认为是“谋乱之头目”，应予就地“正法”⁷⁰。在这情况下，容闳不得不离开祖国，前往美国侨居。

维护国家主权 反对外国侵略

容闳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对外国侵略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大量输入鸦片，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等侵略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坚决主张应该由中国“完全行使其主权”，让中国人自己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的。因此，必然遭到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和反对。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首相巴麦尊便公开声明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使“全中国内部全局得入正规”；当太平军夺取苏、浙等地进攻上海时，驻扎上海的外国军队对太平军“严为戒备”、“炮艇密布”、“严密巡逻”，甚至悍然开炮阻击。侵略者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引起了容闳对外国侵略者的反对，并揭露他们的罪行。

在他的“教育计划”中，针对侵略者干涉中国主权行为，提出“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此项主张，后被李鸿章等人采纳，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招以华商股本，削弱了外国轮船公司在华的势力。外国侵略势力除了用武力妄图征服中国外，还以传教、设教堂等手段侵犯中国主权，毒害中国人民。对此，容闳郑重提出，要“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外力之侵入”。他说：“今日外人势力之放肆，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外国“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几有管辖全权，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讯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是实不正当手段”。他要求政府急谋防范，设法禁止外国教会侵犯我国主权，如“涓涓不塞”，必然“成江河”，整个中国将被外国控制。容闳的正义呼声，执行投降媚外政策的清政府根本不听，反面协助外国侵略者镇压各地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

凡是中国领土主权应“必争”，对外国侵略须“抵制”。在建议造津镇铁路时，容闳提出了这一正确主张。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建造铁路，完全是中国的权利，主权为中国所有。可是，德国侵略者认为，“山东造路之权为德国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这是德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容闳批驳说：“此种理由，殊为奇特，任翻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律，皆不能得其根据之所在”，建造津镇铁路完全是中国“固有之主权”，岂容外国干涉。中国“自修津镇铁路实为抵制之方，利权固在所必争，大局尤刻不容缓”。^⑩可是，清政府中“无人能证条文驳斥德国人的无理要求”，他们深恐惹起“国际交涉”，所以“唯外人之命是听”。容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侵略，是光明正大的爱国主义行为。

外国资本主义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把持海关，划分势力范围，输入鸦片、各种机械，设厂办学，掠夺中国资源，毒害中国人民，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皆有莫大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使劳动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而清政府以“愚弄人民为能事”，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出卖祖国主权，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综上所述，容闳的爱国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反映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要求维新中国的远大理想。但他提出的“种种政策皆无效”，所有改革方案都不能实现，其原因在哪里？我认为：

首先，容闳所处的时期，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他的改革主张，目的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如按他的主张去做，既要危及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利权，又要动摇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这就必然遭到内外顽固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只要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存在，不仅容闳的改革理想不能实现，而且使多少有真才实学的改革人士遭到尘封土埋。

其次，由于清朝统治者顽固守旧，鄙视西方的科学技术，厌恶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他们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视为“奇技淫巧”，认为学习西方会“变夏从夷”，不准人们学习。他们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明人士和留学生，不仅不肯重用他们，反而时刻提防他们，当异己看待，极力排斥。

再次，容闳一事无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把改革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无知识，自己又无力量，实现改革理想只有依靠像曾国藩那样的封建官僚，甚至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软弱。

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封建主义支配着整个社会。它不仅使民主和科学受到窒息，爱国知识分子受到压抑，而且连民族资本主义也没有应有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为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注：①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第37页。（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书）②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一章。③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63页。④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00页。⑤《洋务运动》，第167页。⑥⑦《洋务运动》，第167—168页。⑧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91页。⑨《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三，（见《创办银行章程》）。⑩《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七，（见《铁路条陈》）。⑪⑬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040页。⑫⑭《戊戌变法》（二）第303—304页。⑮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574页。